

崔峰

著

翻译 文学 与 政治

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的部分写作内容获得新加坡教育部项目 AcRF Tier 1 Project RG147/16 (NS)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ts Significance to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资助。

崔峰 著

翻译 文学 与 政治

以《世界文学》为例 (1953—1966)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 崔峰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 - 7 - 305 - 21072 - 3

I. ①翻… II. ①崔…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中国—1953—1966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553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

著 者 崔 峰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8 字数 550 千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1072 - 3

定 价 14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是崔峰博士以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专著。

《世界文学》创刊于1953年，最初命名为《译文》，1956年改为《世界文学》，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终刊，前后14年间共发行134期。毫无疑问，《世界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份文学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国大陆唯一专门刊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公开发行刊物，《世界文学》是中国大陆人民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途径，1950年代以后出生成长的中国作家，外国文学的资源 and 养料大都来自《世界文学》。

本来，像《世界文学》这样重要的文学刊物，早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世界文学》者几乎可以说完全阙如。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这一研究课题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翻译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原始数据的掌握和运用。就材料而言，134期的《世界文学》刊物本身就是重要的第一手数据，必须仔细阅读，深入分析。一般而言，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愿意花时间细读就可以了。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别的原始数据？例如这134期的刊物以及当中所发表的各篇译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世界文学》在编辑运作上的数据？中国作家协会是如何领导和组织出版《世界文学》的？杂志的编辑工作是怎样进行的？翻译作品是怎样审阅的？译者是怎样参与的？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

须要掌握一些杂志社内部的相关原始数据,然而,要取得这些资料很不容易,这让很多研究者却步。可以肯定,崔峰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得到《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帮忙,找到一些内部数据,解答了不少关键性的问题。

数据的搜集、整理和交代以外,如何做出完整和合理的论述?这往往是更困难的。本书既然以《世界文学》为研究对象,那就属于期刊研究(Periodical Studies)的范畴。期刊研究可有什么特定的样式或方法?这是近十余年西方开始积极探讨的问题。早在2000—2001年,我曾参加过欧洲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组织的研究群组,并在德国马堡(Marburg)开过一次工作坊,题目叫“Subscribing to a New Culture: Chinese Literary Journals of the 1910s”,探研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杂志。除欧美学者如贺麦晓(Michel Hockx)、冯铁(Raoul Findeisen)、Dennis Gimpel、胡志德(Ted Hutters)、李欧梵、奚密、李海燕等外,大陆参与的学者有王晓明、陈平原、夏晓虹、袁进等,台湾方面是彭小妍,香港则只有我参加。我们当时各人分头负责一份期刊,在工作坊中报告。不过,印象最深刻,且讨论得最多的是研究方法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去研究期刊和杂志?必须承认,尽管工作坊已汇集了当时世界各地中国文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但就是今天回头看,也见不到最后提供了什么具体和明确的方向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期刊研究。我们都认同研究期刊与研究个别作品不同,应采用与过去多以作家或一部作品为研究对象所不同的研究方法。大体而言,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相对会较简单,因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位作者和一本作品,且在大多数情形下,出版日期也只有一个,所谓的时代背景也较易处理;但期刊杂志直接牵涉很多人和事,编辑、作者、译者,以至出版机构的负责人,都对期刊产生不同的作用,更不要说期刊还可能与广大读者做长期的互动。此外,值得研究的期刊出版时段一般较长,社会、政治背景和形势也会随时代而变化,从而影响期刊的人事编制和内容。在复杂的人际网络和外在因素下,一份期刊又可以怎样维持或宣称是完整独立的个体?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

年间，中国政治界、思想界、文艺界和学术界都经历过很大的变化。内部方面，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胡风事件、反右倾运动，从大跃进进到“文化大革命”，出现过多少次的思想运动，多少文化人遭受批判与清算；对外的政治方面，不单有与西方世界的冷战，还有从紧贴苏联老大哥到中苏交恶，以至对亚非拉的亲近，都对以翻译外国文学为主要任务的《世界文学》有直接而大力的冲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研究《世界文学》时所不能回避的，只是这些课题本身已很复杂，再联系到《世界文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那就更是困难重重了。因此，自一开始我便不断告诫崔峰，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题目，要认真考虑。不过，崔峰愿意迎难而上，以此题目完成博士论文，更经过好几年的修改，出版成为他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诚属可喜可贺。

崔峰是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职四年间（2006—2009）唯一招收的博士生，在那些给大学行政事务淹没的日子里，不但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就是指导学生的工作也大受影响。与崔峰讨论博论，不可能在正常的办公时间内进行，幸好那时候我住在南大的校园内，在周末或晚上稍为有空的时候便马上把他喊过来谈论文，运气好的时候能一口气谈上两三个小时，但也有不少时候给突然来袭的电邮电话打断，要赶紧处理事务。崔峰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在断断续续、不成系统的指导下写成的。

毫无疑问，崔峰是勤快用功的。他对学术充满热诚，以积极的态度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完成一个本来十分陌生的课题，很是难得。应该指出，崔峰今天所呈献给读者的专著，与他原来的博士论文有颇大的分别。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补充了更多西方的学术资料，除英国外交部和美国中情局、国务院一些冷战时期外交解密数据外，西方学术界在苏联及东欧文化和文学、中苏和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补充着我在前文所说有关《世界文学》本身原始资料的匮乏，同时也响应了我过去一直向崔峰提出的一个问题：在外面写博士

论文,跟在国内会有什么分别?答案就是能够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包括研究数据和视野。

这次为崔峰新著作序,让我想起大概在六年前为另一个学生唐欣玉《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写的序言。欣玉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个招收和毕业的博士,《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也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能出版,因为那的确是一本扎实的著作。但我为她写序时本着严师出高徒的想法,板着脸说还有不少改善的空间,鼓励和称赞的话说得太少了。后来《被建构的西方女杰》印出来,欣玉送来一本,重看为她所写的序言,自己也觉得难受,想到可能也让欣玉难过了。当然,我很明白欣玉没有半点不满,但这事其实一直令我耿耿于怀,只是始终没有机会向欣玉说一下。现在就借为崔峰新著写序把这事抖出来,对我个人也算是一种舒解。

从前,我毫不热衷招学生,这十余年招了欣玉、崔峰,还有不少已毕业和在读的同学,让我彻底地改变了这态度。这不单是为了学术的传承,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很感恩在孤寂的学术路途上,除一直得到许多前辈和同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外,能够遇上这些勤奋、正直、善良,对人生和学术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相互鞭策,一起砥磨,这早已超越了所谓的“教学相长”,而是一种推动我不断向前的力量。祝愿他们丰盛成长,为中国学术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
翻译系主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语境	20
第一节 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组织 ——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文联”、“文协”的成立和影响为中心	20
第二节 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	39
第三节 1950年代初政治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创刊	53
第二章 “一边倒”政策的实施与中国作为苏联“小兄弟”的民族国家地位 ——对苏俄作品的大力译介(1953年7月号—1956年3月号)	72
第一节 该阶段译介情况总览	76
第二节 为《世界文学》溯源——从《发刊词》说起	93
第三节 “日丹诺夫主义”的“余威”与“解冻文学”的“初萌”： 两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与交织	103
第四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译介特点	151
第三章 对苏联发展模式的反思与中国民族国家地位的自我提升 ——苏联“解冻文学”的多舛命运及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译介 (1956年4月号—1958年7月号)	207
第一节 该阶段译介情况总览	212
第二节 文学话语对民族国家地位的焦虑与反思 ——以《世界文学》译作择取观念的变化为中心	235

第三节	命运多舛的“解冻文学”译介·····	263
第四节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译介·····	299
第四章	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与中国对民族国家地位的再次提升 ——亚非拉文学的集中译介(1958年8月号—1966年3月号) ·····	335
第一节	该阶段译介情况总览·····	338
第二节	从“译文”到“世界文学”·····	384
第三节	“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博弈”·····	402
第四节	亚非拉文学的大规模出现·····	423
第五节	《世界文学》的停刊·····	437
结语	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拓展·····	443
引用文献	·····	450
附录	《世界文学》(1953.7—1966.1)总目录·····	482
后记	·····	596

绪 论

一、研究方法

传统的翻译研究将原著视作判定翻译的权威。技巧的提高、理论的分析、译本的比较与评判,以及由此直接引出的对所谓“好”、“坏”翻译家或“好”、“坏”译作的决断等,都是将译文视为原文的附属品,译文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原著中心论”(original-text oriented)的论述模式本质上只能算一种翻译实践或技巧层面的“翻译批评”,而非学术性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科目,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在西方出现。以译文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模式将译作从原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传统翻译批评中对原著过于依赖的局面得到突破,译作成为翻译研究中可被视作独立研究对象的“生命体”。

作为这类研究观念的深入与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①提出之后,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让我们看到“翻译并不是一项‘单纯’(innocent)的工作,而是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②。“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③开始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提莫志克(Maria

① 苏珊·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 1990 年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和文化》[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èv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0)]里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

②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页 33—34。

③ Maria Tymoczko and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Press, 2007). p.vii.

Tymoczko)看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了“权力转向”(power turn)^①,翻译活动的背后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而同时“翻译又建构着特定文化的权力结构”,因此“翻译与权力之间的操纵互动、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操纵互动、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的操纵互动、知识与翻译之间的操纵互动,形成一个内在的、互动的、循环的链条”^②。根茨勒和提莫志克具体指出:

如果人们用话语(discourse)建构出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模样,那么个体如何影响文化变迁?我们该如何跨过各个群体的文化差异,拥有不同或全新的体验?我们该如何打破单一具体化的世界观……令多样化的文化真正走入社会之中?虽然现阶段的翻译学都承认翻译活动无法完全忠于原文——一直都存有翻译上的错误、更动或是主观解析——但同时也肯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将一部分的文化植入现有的文化里。翻译对文化的变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翻译以什么形式出现才能彰显最好的效果?又怎么与权力关系如文化统治、文化主张和文化阻力相互影响?这些问题使翻译活动及历史中的权力关系浮出水面,隐喻着“文化转向”也是一种“权力转向”。^③

在这样的研究理念之下,本书将《世界文学》置于历史文化的语境中,考察翻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课题属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也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将翻译文学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为达到某种文化目的而做的翻译上的处理及其文化效果等;并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和意义。本书将结合近年来解密的美

① *ibid.* p. xxviii.

② *ibid.* pp. vii - viii.

③ *ibid.* pp. xxviii.

国、英国外交档案与学界的最近研究成果进行个案研究,力图对传统文学翻译的研究,从观念、结论、研究方面形成突破。

洪子诚提到作为文学生产重要场地的杂志和报纸,在1949年后不再拥有“相对于独立政府的‘公共论域’的性质”,指出1949年后国家开始“以组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学生产,对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评价,根据意识形态目标加以管理、调节、控制”^①。洪子诚认为这个问题是了解当代文学的“‘本质’的关键”,其中“涉及作家的身份,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学刊物的性质和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创作的组织方式,发表方式,评价机制;涉及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的机构性质和职能”^②。可以说,洪子诚所论及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同样适用于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范畴,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期刊的操控亦是了解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的“本质”所在。

从方法论上讲,以《世界文学》为例,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作家,包括译者和原作者。《世界文学》选择了哪些原作者的作品?为什么要选择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译出语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意识形态是怎样的?被介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后,他们的哪些资历或背景被“符号化”或“意识形态化”了?他们的作品由谁来翻译?为什么由他们来翻译?这些中国的翻译家们在当时的身份又是怎样?这些译者是怎样认识原作者及其作品的,怎样认识译出语和译入语(1950—1960年代中国大陆)两种文化体系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两种文化的碰撞有没有因为译者的存在而产生阻滞、误解、扭曲、增缺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与译者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它们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语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译作。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译作?译作的来源怎样,包括其来自怎样的

①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29。

② 同上。

译出语文化语境？哪些性质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受到重视，而哪些作品又被刻意地“忽略”或“遗忘”？它们与中国当时的文学作品有何区别或共同点？

读者。《世界文学》阅读、批评的对象是哪些群体？他们知识、年龄、资历结构怎样？他们对这些译作的接受与反应如何？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这些接受与反映怎样影响了译作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和研究？有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办刊进程产生影响？

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内外。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内针对文学及翻译的主流观念是怎样的？哪些属于诗学(poetics)方面的问题，哪些属于意识形态(ideology)方面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如何影响了包括《世界文学》办刊在内的翻译活动的发展？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s)（主要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与主流观念之间的关系怎样？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外文学翻译的赞助人(patronage)由谁来担当？为什么由他们来扮演这个角色？他们有没有为1950—1960年代的文学翻译建立一套机制？他们与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内的“专业人士”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出之后，诸多研究者已经深切体会到，所谓翻译研究因为越来越多地需要从文化研究的层面展开，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这门学科之内。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为翻译研究者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把这些方法应用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看到《世界文学》这部杂志在这段翻译史中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以及更好地解释围绕《世界文学》出现的相关“翻译现象”。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除了包括中国翻译史及相关的翻译家研究外，还涉及文学史、中共党史、思想史、外交史、出版史等领域的研究。

二、研究意义

从翻译、文学与政治的角度对《世界文学》进行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弥补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研究的缺失。正如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理论所认为的,翻译对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文学多元系统里翻译文学是必须包含在内的一个重要系统。^①

为了表现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文学多系统的面貌,已有不少论文从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文学批评、文学体制、文学理论、文学刊物、文学史料等子系统层面展开研究,积极参与建造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多系统中心的工作。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论文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试图建构 1950—1960 年代文学多系统的面貌,其中有的作品已经就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如政治、经济的相互关联展开分析。但在这些论文论著中,我们鲜有看到讨论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我们承认,在佐哈尔的系统理论里,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视乎与译入语文化里原来的文学系统及其他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既可占据主要位置(in a primary position),也可处于次要位置。^②但至少可以说明,缺少翻译文学而建构起来的文学多元系统显然是不完整的。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学、文化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无论亲疏、主次,都是值得研究的翻译现象或文学现象。对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结果可以与诸论文著作从文学的其他层面所建构的文学多系统面貌,形成补充、呼应,甚至质疑。

当前对 1950—1960 年代翻译文学研究的论文为数不多。不同学者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切入点会有不同。当我们重新试图寻找、进入、触摸那个时代翻译文学所生长的生态环境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寻找时代气息的物

① 有关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相关论著可以主要参考: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Theory," *Poetics Today* 1(1-2, Autumn, 1979), pp.287-310. 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99-204.

②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p.199-200.

化形态——报章杂志，从当时出版发行的报刊中获取个中消息。有学者如是评介文学期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就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种类繁多，除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创造》、《现代》、《译文》等外，其他综合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等，也译载过不少外国文学译作和评介文章，并且像《小说月报》、《文艺月刊》等期刊都设有“海外文坛消息”、“文艺情报”或“世界文艺动态”等栏目，及时报道世界文学的发展动态，体现了中国的文学家们追踪世界文学发展、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愿望和努力。这些期刊将外国文学译介文章与文学创作和中国文学评论并置在一起，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翻检这些刊物，就能对当时某个作家、某篇作品译介的时代文学语境获得感性的认识、获悉当时文坛的风气，做到“了解之同情”，从而也就能真正深入当时的文化语境当中，切实地分析外国文学翻译选择的时代文化原因。如果说中译单行本的出版发行构成翻译文学史发展的躯干和动脉，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文学报刊上的译作和译介文章，就是血液、细胞和神经，使得一部翻译文学史真正鲜活、生动起来。这样，我们在史述中国翻译文学时就不仅能够回答“是如何”，还有可能在一定的深度上回答“何如是”。^①

因此，对《世界文学》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弥补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文学多系统中翻译文学研究的缺失。

其次，《世界文学》在中国大陆 1950—1960 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中，是一份影响大、范围广、政治地位高的重要期刊。但迄今为止还鲜有学者对这份期刊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世界文学》创刊于 1953 年（当时刊名为《译文》，1959 年更名为《世界文学》），其时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的刊物（月刊）。从 1964 年 10

^①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页 14—15。

月起,《世界文学》划归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改为双月刊)。1965年编辑部停刊整顿一年,1966年2月《世界文学》复刊,但仅出一期便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刊。1977年10月,《世界文学》以“内部发行”形式复刊,试刊一年后,1978年10月改为公开发行。

从1953年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夕停刊,14年间,《译文》(《世界文学》)共发行134期,共发表了多达131个国家和民族的1432位作家的作品;译作数量共计2827篇,其中诗歌(含史诗)1159篇;小说676篇;论文313篇;民歌121篇;书简(含信)93篇;散文(含人物素描、随笔、笔记、速写)72篇;谚语71篇;故事(含革命故事)55篇;日记39篇;特写40篇;剧本(含儿童广播剧、广播剧、悲剧、朗诵剧、独幕剧、电视剧、话剧)33篇;格言28篇;回忆录(含革命回忆录)27篇;发言(含开幕词)17篇;小品(含讽刺小品)16篇;寓言15篇;杂文(含杂感、杂记)8篇;散文诗8篇;传记(含自传)7篇;轶事7篇;通讯(含国外通讯)4篇;游记3篇;讲演(包括讲话)2篇;访问记3篇;史料3篇;报告文学2篇;祝词2篇;谈话录1篇;传说1篇;歌谣1篇。

按国别划分,有共计124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作品译载在该时间段的《世界文学》上,其中译介数量超过100篇的译介国家有:苏俄525篇,日本171篇,法国165篇,美国150篇,民主德国(含分裂前的德国)149篇和越南112篇。

另外共有850位译者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作品。在当时一份期刊能包括如此众多的翻译家及外国文学研究者,且得到了中国当时几乎所有最优秀的翻译家及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鼎力支持,仅《世界文学》而已。

作为1950—196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发行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它成为当时中国国民了解、认识外国文学作品、文艺动态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世界文学》前主编高莽(1926—2017)就回忆说:“当时《世界文学》是全国唯一一种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它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数万,甚至更多。”^①

^① 高莽《新时期〈世界文学〉杂志散忆》,见《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页14。

当时的《世界文学》是一部国家级的外国文学刊物，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担任首任主编（1953—1959）。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创刊四十及五十周年时，介绍与庆祝的媒体名单中看出其所“享受”的高级别待遇：《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文艺报》、《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以现今中国政治级别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几份报纸同时对《世界文学》周年创刊的介绍情况来看，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期刊确不多见。

但是目前，无论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翻译研究的角度，还没有一部论著系统深入地研究《世界文学》，诸篇文章对《世界文学》的关注仅仅停留在介绍、回忆及简要分析几个层面。

介绍层面主要是介绍该刊出版发行、编辑部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过去与今后的办刊方针、围绕该刊召开的庆祝会或研讨会情况等。^①

回忆性的文章主要出自曾经在《世界文学》工作过的编辑及翻译家、读者之手，其中就包括了《世界文学》前主编高莽的回忆录。他们大多以叙述的方式回忆当年与《世界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与围绕着它发生的故事等。这类文章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②

^① 相关文章有：绿原《让“火”燃得更旺更远更久些——一个老读者的祝愿》，见《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页8—11；《〈世界文学〉创刊50周年纪念会举行》，见《文艺报》，总第2164期，2003年10月25日；《〈世界文学〉创刊50周年》，见《环球时报》，2003年10月31日；海舟子《“让火燃得更旺更远更久”……——〈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年纪念会侧记》，见《世界文学》，2003年第6期，页302—304；余中先《总序》，见《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页1—5；《世界文学》编辑部《致读者》，见《〈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等等。

^② 相关文章主要有：高莽《高莽自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的相关篇章；黄宝生《黄宝生自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的相关篇章；余华《说说〈世界文学〉》，见《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页12—13；高莽《浓浓信中情》，见《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页122—127；张佩芬《一次美丽的经历——追忆吴祖光、新风霞的鼎力相助》，见《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页128—131；车前子《记忆》，见《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页131—134；李政文《我要说的话》，见《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页135—38；孙经武《仍然是一些零碎的回忆》，见《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页5—7；高莽《新时期〈世界文学〉杂志散忆》，见《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页13—20；（见下页）